

潜伏在总统府附近的红色银行

6月9日下午6点,原来晴热高温的常州突然变天,90岁的老人沈允林坐在环北新村的家里,拿着一张老照片喃喃自语,“没想到,真的没想到,这是共产党开的银行。”这张老照片摄于1947年的南京,当时沈允林只有26岁,刚刚进入建业银行南京分行工作。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,他和两名安插在银行内部的地下党员一起工作、生活。直到解放后,沈允林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。近日,他又得知了一个更惊人的消息:解放前自己曾工作过的这家银行,竟然是周恩来打造,共产党控制,“潜伏”在国民政府首都的金融核心。

据快报记者调查,建业银行南京分行位于昔日的太平路335号,今天的太平商场附近。这里距总统府只有千米左右的距离。很难想像在国共两党不共戴天的解放战争期间,在国民党政权的最核心地带,竟然活跃着一批特殊的共产党人,竟然运转着一家“红色银行”。

□快报记者 石磊

民国户籍卡勾起往事

5月9日,快报A8版刊出了一篇名为《南京发现“宋美龄民国户籍卡”》的报道,该报道称经过3年清理消毒,150多万张民国户籍卡片重见天日。通过这些泛黄的卡片,不管是达官贵人,还是平头百姓,都可以找到当年在南京居住生活的“印记”。南京市档案馆表示,民国户籍卡片已经逐步向社会开放,提供查阅。如果读者有亲人1945年至1949年在南京居住、生活,只要带上身份证,就可以到档案馆查阅。

这则消息引起了常州市民沈一新的注意,因为他和父亲沈允林、母亲蔡静珍,曾于解放前在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。看到报道的第二天,沈一新就赶到南京市档案馆,请工作人员帮忙查询相关户籍资料。档案馆工作人员查到了沈允林和蔡静珍两人的民国户籍卡,并把照片发往沈一新的电子邮箱。沈允林和蔡静珍夫妇怎么也想不到,自己能找回60多年前的“户口本”。

6月6日,沈一新把这些照片发给了快报。由于年代久远,沈允林和蔡静珍的户籍卡有些泛黄,但内容看起来却很规范。沈允林的身份证号为“2字116300”。据了解,当时户籍卡片上的身份证号由字和号组成。“字”代表居住的辖区,1字是现在的玄武区,2字是现在的白下区。

户籍卡显示,沈允林生于民国10年(1921年),本籍江苏武进,从民国36年(1947年)4月开始在南京居住,文化程度为高中,职业为“业别”一栏填的是银行,工作地点是太平路335号。蔡静珍的卡片相对简单些,她生于民国17年(1928年),本籍和沈允林一样,也是江苏武进,初中毕业,职业一栏填的则是家务。

沈一新表示,让他父母感觉很惊奇的是,户籍卡上的“户主”一栏是胡彦尊的名字。“我父亲当时在建业银行南京分行工作,胡彦尊是银行经理,可我父亲此前并不知道,自己的户主竟然是他。建业银行南京分行原址太平路335号,不知现在还有没有了?如果还在的话,能否建议给予保护,毕竟它也算历史文物了吧。”

消失的建业银行南京分行

沈一新提供的线索显示,建业银行南京分行在当年的太平路上。据了解,当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,各种金融机构迅速前来“扎根”。到1937年,除了特许的中央、交通、中国农民银行及邮汇局等5家银行机构外,还有省市银行、商业银行等共30家,新设银行多在中山路、太平路一带。

据南京市地名办专家介绍,1

国时期的太平路,就是现在的太平南路,“而且是从山东路到白下路这么一段。”当年的太平路,是南京商店最集中的地段之一,甚至流传这样的说法:买口红就去太平路上的太平商场,准没错。

6月8日,南京高温,但法桐树“笼罩”下的太平南路却并不是特别闷热。从山东路拐进太平南路,抬头依旧能看到“商业街”的招牌。顺着路往里走,能陆续看到宝庆银楼、古籍书店、太平商场、绿柳居等老字号,可唯独不见建业银行南京分行。在路边树下乘凉的市民老徐说,“我从解放后就搬到太平南路了,这里的银行倒是很多,交通银行、建设银行都有,可从没听说过建业银行。”站在一旁等公交车的市民老张也表示,“我在这生活了50多年,不知道有这个银行啊,可能解放后就消失了吧。”

周边居民不知道,相关部门也难以查到建业银行南京分行的下落。南京市白下区民政局地科工作人员为难地说,“因为这一段地名变更过,所以当年的太平路335号很难查找了。”人民银行南京分行的工作人员,对建业银行也感到陌生,“我们没有听过这个银行”。

6月9日上午,记者来到南京市档案馆,工作人员帮忙调出了建业银行南京分行经理胡彦尊的户籍卡。胡彦尊的名下,竟然挂着23个孩子,且地址都是太平路335号。“民国时期实行保甲制度,胡彦尊是经理,因此成为银行员工的户主并不奇怪。我们还发现过,当时一个国民党情报组织的头目,也是手下几十个的户主。”

然而,胡彦尊名下的23个人里,有一个人却特别引人注意——1938年参加革命,长期从事地下斗争的王首民。为什么地下党会成为建业银行南京分行的员工?这个银行到底有什么秘密?问题的答案,恐怕只有沈允林知道。

“通过熟人介绍进去的”

6月9日下午,常州高温,沈允林坐在环北新村的家里,手中捏着张老照片,“这是建业银行南京分行开业那天照的,银行在太平商场附近,但门面不大,很低调。”照片中的沈允林梳着分头,穿西装打领带,由于年代久远,只能依稀看出他身后的大门上,写着“南京分行”四个字。照片的背面还写着拍摄日期:民国36年5月12日。

沈允林说,他出生于常州的大户人家,父亲在上海怡和洋行工作,“很小的时候我就去上海生活,侵华日军占领上海前,洋行把我和母亲送到汉口避难。由于走的时候很匆忙,很多东西没带出来,母亲一着急就去世了。洋行听到这个消息后,又把我送到香港避难。”

“局势稍稍平稳后,我又回到上

海读高中,毕业后又念了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,当年我左右手都能打算盘。”沈允林回忆说,“一开始我在上海一家银行工作,可不久就关门了,后来去了建业银行当办事员。”

根据相关文献资料记载,1943年,化工实业家范旭东创办了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和久大盐业公司,首创一家集聚社会游资以扶持正当工商业发展生产的银行。根据当时的规定,要有两个以上已注册的银钱业合并方能组成一个新银行,因此建业银行由重庆和济钱庄与成都振华银号合并增资改组而成,资本1000万元。1944年6月1日开业,总行设于重庆,行址为重庆民族路117号。原和济钱庄董事长汪代奎任董事长,永利化学工业公司财务协理范鸿畴(范旭东的堂弟)任总经理,龚再僧任常务董事。1945年1月,因总行业务部经营不善,亏损严重,董事长兼总经理双双请辞,由李维城代董事长,龚再僧代总经理,后经增资改组,范鸿畴改任董事长,龚再僧担任总经理。抗战胜利后,龚再僧陆续在长沙、上海、南京、汉口、天津等地增设分行。

沈允林能进入建业银行,范鸿畴和龚再僧起到了重要作用。“我们家和范鸿畴有亲戚关系,我的五叔沈国燕当时在重庆总行当襄理,也是三把手。后来调回上海筹办分行,有时候便带着我和龚再僧一起吃饭,后来便让我进入建业银行工作。”

时至今日,沈允林还保留着一张建业银行服务证,上面写着:兹有沈允林君保任苏省武进县人……于(民国)36年4月进入本行为行员,合予证明。签字者正是龚再僧。

和两个“进步人士”住一起

1947年刚到南京工作的时候,沈允林还是个单身汉,银行便安排他住在位于八宝前街的员工宿舍,舍友是王首民、张庆祥、恽敏善。沈允林和张庆祥都是办事员,王首民的职务则是会计股长。沈允林表示,几个人虽然是上下级关系,但相处得很融洽。“恽敏善虽然也是常州人,但他性格比较孤僻,我们不怎么和他啰嗦。”

“王首民经常带我去当时的中央银行,参加银行员工联谊会,有时候叫我帮他这些东西。”在沈允林的印象里,王首民和张庆祥都是“很进步”的人,“他们经常给我看从解放区带过来的报刊,当时国共双方在打仗,国统区的报纸和解放区的报纸,关于战争结果的消息常常是截然相反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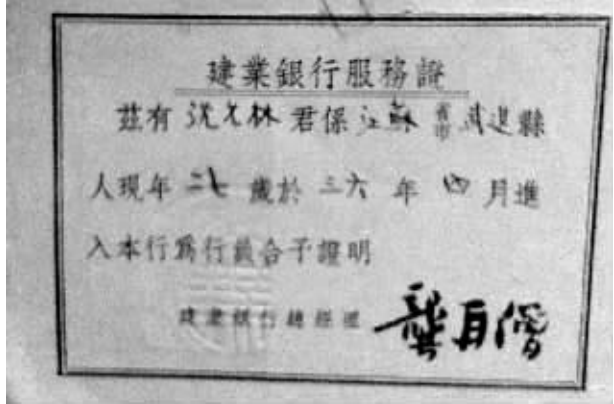
沈允林回忆道,建业银行除办理一般商业银行业务外,与永利、久大等公司业务往来很频繁,“范旭东在江浦有个厂,每个月厂里发工资的钱都要从银行走。当时江上没有桥,工厂就会派轮船到岸边,银行则派汽



1949年5月28日,原建业银行总经理龚饮冰(左一)作为军代表与冀朝鼎(左二)等率队进驻中国银行 资料图片



银行开业那天,沈允林在银行门前拍照留念



沈允林的“工作证”



回忆起那段特殊岁月,沈允林夫妇显得很激动 快报记者 石磊 摄

车把钱送上船。王首民很信任我,有时候就叫我去送钱。还有一次,我们查出来有位银行副经理,私自把库房里的金条拿出来抵押,王首民知道后很不高兴,他为人很正直。”

后来,沈允林在南京娶蔡静珍为妻,并生下沈一新,而王首民又成了蔡静珍的救命恩人。“王首民的夫人得了伤寒,找了个西医来看,结果病没好人却去世了。”后来,蔡静珍也得了伤寒,王首民一家便给沈允林推荐了一个有名的中医。“但那个医生吸食鸦片,白天从不出门,只有晚上才出来替人看病。我和王首民只好半夜出去请医生,吃了一天中药病就好了。要不是有他的话,结果真不好说。”

楼上就藏着国民党特务

八宝前街的房子,是银行帮沈允林、王首民等人租的。住了一段时间之后,他们发现,住在二楼的房东有点不对劲。

“那栋车是从南京到上海的,火车站人非常多,火车一来都争着往上爬,甚至还发生了踩死人的事件。我们一家回常州的时候很匆忙,只带了钱和衣服,家具全丢在南京了。”

现存于南京档案馆的“建业银行南京分行员工薪金表”,清楚地记录了当年职员被遣散的全过程。1949年2月的薪金表上,突然多出了一栏“旅费”,显示发放给沈允林等数名职员10万圆券。“说是旅费,其实就是遣散费。”这从侧面印证了沈允林夫妇在那个月离开南京的说法。

再回南京,熟人是共产党员

回到常州之后,沈允林借丈母娘的房子暂时安定下来,随后和蔡静珍又生了一个孩子。“我想尽快在常州立足,就用南京工作期间省下来的钱,在青山路开了一个卖副食品的小店,收入还不错。”沈允林说。

随着局势逐渐平稳,建业银行南京分行宣告复业。1950年9月1日,银行方面给沈允林寄来一封信,里面写着:因业务需要增添会计部门工作人员,有条件复用前离职人员,到行后暂试用一月期满的成绩良好予以正式录用……不过,考虑到要照顾家小,沈允林并没有前去南京。

1951年4月20日,沈允林又收到了建业银行南京分行的信,这次信封里还附带着一位老同事的信:此间人手甚少,工作紧张,望你择信后速速来宁。“收到这封信,我就去南京工作了几个月。”

沈允林回到南京后1个月,新华、中国实业、四明、中国通商、建业5家银行宣告成立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,原先的建业银行南京分行经理胡彦尊,成了总管理处

可以过得不错。”沈允林说,“我们家旁边是一家外国人开的饼干厂,我给我儿子买饼干,都是一罐一罐往家里搬的。”

后来,正是发生在这家饼干厂的一件事,让沈允林夫妇下定了回常州的决心,“当时南京物价飞涨,大家拿着一捆一捆的钞票去买东西。饼干厂虽然已经停产,但还是有人跑进去抢面粉,结果不小心掉进了堆面粉的池里,活活被呛死了。”1949年2月,沈允林夫妇决定带着儿子回常州。2月15日,银行给他开出了一张证明书,上面写着:沈允林君在本行担任办事员,计服务1年9个月特此证明。

蔡静珍至今还记得,当年一家人在下车坐火车逃离南京的情景。“那趟车是从南京到上海的,火车站人非常多,火车一来都争着往上爬,甚至还发生了踩死人的事件。我们一家回常州的时候很匆忙,只带了钱和衣服,家具全丢在南京了。”

建国之后,龚饮冰曾出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等职。王首民则于上世纪60年代初从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办公室主任上调中国银行总管理处,于1956年被派往香港,担任中国公私合营银行联合香港办事处(联办处)主任。“解放前,我只知道龚饮冰和王首民一个是大老板一个是部门领导,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。事后回想起来,当初发现八宝前街的房东不对劲,王首民之所以去报警,可能就是这种试探。”

的秘书处副处长。沈允林还得知了一些更惊人的消息——原先和自己住在一起的王首民和张庆祥是共产党员,甚至曾经一起吃过饭的建业银行总经理龚再僧也是共产党员。

龚再僧原名龚饮冰,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成为建业银行总经理之后,下属分行均安排有地下党。成都分行有孙克钦、张显惠、华永福,上海行有王首民、张庆祥,后均调南京分行。天津分行无党员,但聘请地下党员李再耘为顾问,党员间单线联系,借银行职业掩护进行秘密革命工作。

龚再僧“暴露”于1949年5月28日,当天,他手持陈毅、粟裕亲自签发的命令,率队来到上海外滩接管中国银行,一些老员工看见身穿解放军服装的龚再僧时都惊慌万分,“他不是外滩的建业银行总经理吗?”

“这是共产党的银行”

重回南京工作了几个月后,考虑到爱人要照顾两个孩子又要开店,实在忙不过来,沈允林就又回到了常州。沈允林说,文革期间,他因为解放前在银行工作过,被送进了“学习班”审查。“被审查期间,我想到了王首民,只有他能说清楚我的问题,但当时我们已断绝了联系。”

文革结束后,沈允林终于过上了安稳的日子。他当过菜场会计,退休后又给企业当会计,收入比较可观。他原本以为,自己就将这样度过余生,可最近儿子沈一新又有新发现——周恩来的秘书童小鹏在《风雨四十年》一书中提到了建业银行,“范旭东的化工企业中国制碱公司,抗战爆发后毅然迁到大后方重建新厂。新厂进口了的机器全部被蒋介石的远征军征用,国民政府决定给三百万元贷款。新厂建成后,国民政府突然变卦,要把贷款作为公款,企图并吞新建工厂。为了求得企业的生存,范旭东打算自己创办‘建业银行’,以取得周转资金。周恩来知道后,指示龚饮冰与刘少文、卢绪章(他们都是为党在社会上做经济工作的)商量,又与范旭东晤谈,决定参加建业银行的筹建,以党的营运经费参加,在资金(起先是百分之十七,后来百分之四十四以上)、人力(龚饮冰任常务董事,后任总经理)方面给予支持。”

在重庆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

发行,印量仅2000册的《重庆金融》中,也有类似的记录:周恩来派龚再僧与范多次晤谈,决定由中国共产党投资帮助建立。银行命名建业,由重庆和济钱庄与成都振华银号合并增资改组而成。资本1000万元,其中和济钱庄、振华银号原股本合计为350万元,余650万元是扩充的新股。新加入资本中,永利和久大公司投资最多,龚再僧受党组织委托出任的投资居次。1945年5月股东大会增资改组,增资为5000万元,占共产党投资的转占首位,占资本总额的44%。在龚再僧的领导下,建业银行下属分行均安排有共产党员,分散在各地行,一方面对党的投资负责,一面借银行职业掩护进行秘密革命工作。”

“看到这些之后我们才发现,父亲原来工作的单位,可以说就是共产党的银行。”沈一新说。

“不知他们还在不在”

6月10日下午,记者再次来到南京市档案馆,工作人员帮忙调出了一卷建业银行总行的会议记录。1951年6月24日,建业银行举行股东大会,时任建业银行总经理李佩夫在《行务业务报告书》中提到:1950年初到7月5日为止的一个阶段,银行还是私营身份,本人感到非求根本解决办法,无以图存。乃北上商之于龚饮冰同志,以本行原系革命资本与民族资本结合而成,应可申请公私合营……

“革命资本与民族资本结合而成”,这再次说明了建业银行的身世。沈一新听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,“这样看来,那我父亲真的在解放前为共产党的银行工作过。当时在国民政府的首都办这种银行,是很不容易的。”

至于建业银行是不是真如相关文献中记载,是共产党控股的银行,南京市委党史办工作人员表示,“当时南京分行的经理胡彦尊,可能是地下的外围人员,但建业银行的具体情况,我们并不清楚。”得知这个消息后,沈允林沉默了一会,因为这个事例要照顾家小,沈允林并没有画下句号。当年建业银行的总经理龚饮冰,和潜伏在银行内部的地下党员王首民,已经先后去世,挂在胡彦尊名下的那些职员,也很难查到踪迹。

“不知道他们还在不在,不知道他们知道建业银行的真实身份后,会想些什么。”沈允林捏着老照片说。

»相关链接

龚饮冰(龚再僧)与建业银行



龚饮冰,1896年9月28日生,湖南长沙人,曾用名龚再僧,龚泽鸿,化名张若臣,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为中共早期银行家。

1927年马日事变后,龚饮冰转入地下,从事党的秘密工作,受党中央领导,曾任中央主管会计并负责白区交通通讯机要财务等工作。抗战爆发后,龚饮冰在重庆以商人身份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。1943年受国民党实业家范旭东为发展永(利)久(大)集团化学工业需要办银行融资,将振华银号改为建业银行。他知道龚饮冰“烧有资金”,联系他参与对银行投资。当时党组织考虑到龚饮冰侧身银行便于掩护党的秘密工作,同意龚饮冰与范旭东共同在重庆投资设立建业银行,1944年6月该行正式成立,龚饮冰任该行常务董事,1945年2月代理该行总经理,6月选为总经理。1945年,为了进一步深入国统区扩大银行掩护地下斗争,龚饮冰决定将因战争未能开业的柳州分行迁沪,改为上海分行,并亲自开展筹备工作。1946年,建业银行总管理处迁沪。该行以沪行为枢纽向沿江沿海及北方发展,先后在南京、汉口、天津设立分行。为对党的投资负责,龚饮冰在各分行陆续安排了一些党员,这些党员连同部分家属党员在银行业务掩护下为党工作。1948年4月龚饮冰去香港前,曾去建业银行成都分行安排秘密工作。1949年初,他离开香港赴北平。后随解放军南下,在上海兼任建业银行董事长,不久任中国银行总经理,在任期间,为增厚私营行庄实力,命令限期增加股本。1949年10月,龚饮冰调往北京,仍兼建业银行董事。